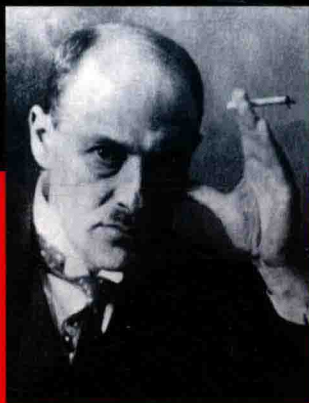


舍勒作品系列

道德意识中的 怨恨与羞感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罗悌伦 林克 译



Ressentiment und Schamgefühle

im moralischen
Bewussts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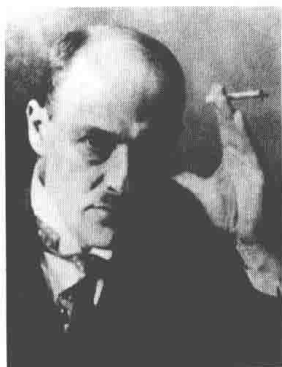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作品系列

道德意识中的 怨恨与羞感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罗悌伦 林克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 / (德) 马克思·舍勒著; 刘小枫
主编; 罗悌伦, 林克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4
(舍勒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21277-4

I. ①道… II. ①马… ②刘… ③罗… ④林… III. ①情
感—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0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DAODE YISHI ZHONG DE YUANHEN YU XIUG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4.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姚 兵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蔡 琪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Ressentiment und Schamgefühle
im moralischen
Bewusstsein

出版说明

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 Dilthey)、西美尔(G. Simmel)和欧肯(R. 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

学年鉴》。自1911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①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②《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20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

①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页；弗林斯(M. S. Fr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参见弗林斯(M. 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 W. 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页。

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①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 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② 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 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 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③ 如

① 参见舒茨(A. 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②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 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 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③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 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ttgart，1961，31页；H. U. 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pzig，1938，85页。

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 20 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① 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

①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 Plessner）：《忆舍勒》，见 P. Good 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揭，20 页。

② 参见克拉夫特（J. 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 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 1911—1922 年。本文依 M. Frings 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 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 页。

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 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① 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②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 Hartmann)、盖伦(A. Gehlen)、普勒斯纳(H. Plessner)，社会理论家

① 参见哈斯康普夫(R. J. 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 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 München, 1966; 舒巴尔特(W. 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 Kyrios, 1937; 舒尔茨(W. 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 Pfullingen, 1980, 421 页以下。

② 参见 K. Kanthack, Max Scheler: *Zur Krisis der Ehrfurcht*, Berlin, 1948, 240 页。亦参见 H. Leonardy: *Liebe und Person; 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ä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 The Hague, 1976; B. Rutishauser: *Max Scheler's Phaänomenologie des Fühlens;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 Bonn, 1969。

曼海姆(K. Mannheim)、舒茨(A. Schulz), 天主教神学家 D. von Hildebrand、斯太茵(E. Stein)、皮茨瓦拉(E. Przywara)、伍斯特(P. Wust)、弗里斯(H. Fries), 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 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① 大半个世纪以来, 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 舍勒要著都有译本, 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②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 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 芝加哥大学舍勒

①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 参见格伊塞(J. Geysl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 尤其舍勒》, Munster, 1923; 弗里斯(H. 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 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 Heidelberg, 1949; 莎夫勒(R. 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 Darmstadt, 1980, 142~186页。

②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 W. Hartmann 编著:《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 1963)和 M. S. Flings 编著:《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 1963—1974》(Den Haug, 1974); 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 参见 R. Kaufmann 编著:《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直补》(Peter Lang, 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 Liu Xiaofeng 编著:《身成身位: 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 1996)所附文献目录。

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 S. Frings)教授接手主编，最后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激情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前言

刘小枫

按较为通俗的理解，所谓现象学方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进行哲学思考时不应纠缠于某种既有的哲学观点或主张，而是直接把握并思考原初的实际现象。自启蒙运动让形而上学走向普及以来，搞哲学的人士越来越多，各种哲学观点和辩难也日渐增多。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中，一个爱好哲学思考的人很容易从一开始陷入种种既有哲学论说中去沉思，翻来覆去地思考，就好像如今我们在现象学观念、语言哲学观念或解构哲学观念中乐而忘返。现象学方法教导爱好哲思的人要“悬置”种种既有

的哲学观念，可谓一扫陈腐的哲学系专业思考，让不少被种种哲学的“主义”观念纠缠不清的年轻学子的脑子为之一爽。由此可以理解，现象学方法论一出，很快吸引了不少哲学爱好者。

然而，“悬置”种种既有哲学观念，不再去动脑筋想比如洛克或康德或黑格尔所思考的东西，爱好哲思的人又该思考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什么样的原初现象才值得去费思呢？看来，搞现象学直观还需要个体天赋，或者说现象学方法并非是谁都能用的，毕竟，真正的哲学直观来自天赋。伽达默尔在《精神的挥霍者》中曾说：现象学圈子的人大讲现象学方法，方法来，方法去，在“本质直观”的天赋上，舍勒独占魁首——即便胡塞尔大师善于哲思技艺和设计思考规则，也未见得有什么让人难忘的原初现象直观。舍勒的现象学直观逮住“情性”现象，直破当时在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康德哲学，彰显实质情感伦理的败坏这一现代性的根本问题，舍勒才的确堪称伟大的直观者。

从对“情性”这一意向性情感的现象学分析出发，舍勒向人的种种基本道德情感现象推进，直观同情、怨恨、害羞、懊悔、受苦感、恭顺感等具有实质道德的人间情感。在舍勒的现象学直观目光下，种种哲人们视而不见的现代性道德疾病逐一显出了其内在肌理。现代性问题可以简括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人心秩序的失序是社会秩序失序的根源。要解决社会秩序的失序，首先需要整顿人心秩序。舍勒的一系列道德情感现

象学论著正是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在舍勒手上，现象学哲学不再是一种技艺化的方法论思辨，而是整顿人心秩序的思想行动。

人心秩序也可以称为“性情气质”(Ethos)，舍勒将它描述为一种体验结构。作为世界的“价值等级秩序”(Wertangordnung)的基石，“性情气质”的现代转型比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转型更为根本。一旦人心的体验结构发生转变，人间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必然发生根本变动。在舍勒看来，现代人的“性情气质”的基本特征是：工商德性的心性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心性气质，这意味着生命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高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颠转。按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性情气质”是一个实质的价值偏爱系统(Wertvorzugssystem)，具体的、实际的价值偏爱构成了生活中某种实质价值优先或后置的规则(伦理)，进而规定了某个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乃至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世界观的结构和内涵，给政治共同体打上时代的伦理印记。古人的“性情气质”与现代人的“性情气质”不同，就因为价值偏爱不同，或者说，对某种实质价值的优先或后置不同。“性情气质”是每一时代和民族赖以做出具体价值评价的基础：古人眼中的德性或值得追求的优良品质，在现代人眼里可能就微不足道，甚至会被视为坏的心性品质，反之亦然。同样，欧洲人心目中的德性或值得追求的优良品质，在中国人或印度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会被视为坏的心性品质。可以看到，舍勒的情感现象学直观远远超出

了纯粹的哲学思辨领域，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

强调“性情气质”的时代和民族差异，似乎会让人推导出“伦理相对主义”，即任何伦理品质或行为的评价尺度都由历史时代或民族群体来决定。然而，舍勒作为哲人并不认可“伦理相对主义”；相反，对舍勒来说，“伦理相对主义”是现代思想面临的巨大挑战。毕竟，“伦理相对主义”将摧毁社会的伦理共契，给政治共同体带来难以克服的社会伦理困难。表面看来，“伦理相对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后果，但在舍勒看来，从哲学上讲，康德伦理学主张的良知决断的个人自主和责任自负，更应该为“伦理相对主义”负责，形式正义的实证法律制度反倒是康德伦理学的延伸。

实际上，舍勒区分了“性情气质”的两个层面：一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中出现的“性情气质”，这属于历史社会学要研讨的课题；二是“性情气质”的纯粹公理法则，这属于现象学哲学要研讨的课题——任何时代和民族的“性情气质”都包含着这两个层面。舍勒反对如下两种伦理学观念：要么以历史具体的“性情气质”勾销“性情气质”的公理法则本身；要么仅关注超历史的“性情气质”的公理法则本身，无视历史具体的“性情气质”。“性情气质”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伦理意识，舍勒对于超历史的“性情气质”的公理法则的现象学探究，旨在为考察现代伦理意识对“价值的颠覆”提供根据。然而，问题在于，要探究伦理意识的公理法则就得考察历史中具体的伦理

意识。毕竟，“性情气质”总是体现为历史具体的伦理意识。因此，在分析伦理意识的体验结构时，需要将现象学直观与历史社会学的视域结合起来。

本辑收入舍勒有关伦理意识现象学的两部非常著名的中篇论著：《道德建构中的怨恨》(1913)和《论害羞与羞感》(1913)。与《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相比，这两部论著明显更多着眼于考察具体的伦理意识。

“怨恨”这个论题来自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提出了这样的著名论断：基督教伦理浸透着“怨恨”。舍勒接过这一论题，从现象学和社会学双重角度反驳尼采认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怨恨”伦理的论断，但舍勒没有否认尼采所直观到的“怨恨”情感本身这一历史的伦理现象——在舍勒看来，“怨恨”是现代资本主义市民伦理的根源。这无异于说，现代性伦理源于“怨恨”伦理。事实上，尼采所谓基督教是一种“怨恨”伦理的论断就是针对现代伦理做出的论断。言下之意，现代性伦理来自基督教伦理。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来自尼采的启发。通过对怨恨意识的现象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综合分析，舍勒力图阐明现代市民伦理的起源、形成机制和“心性气质”的基本法则，进而揭示现代伦理意识与古代(尤其是基督教)伦理意识的差异，从而深化了对现代伦理的理性化认识。

在德国著名思想史家洛维特(K. Löwith)看来，《论害羞与羞感》堪称舍勒的现象学人类学最为卓越的发轫

之作。^①的确，这部论著让我们看到了舍勒如何尝试将他的价值情感现象学向哲学人类学方向推进。羞感作为伦理意识的重要现象本来是一个宗教哲学的论题，俄国现代哲人索洛维约夫在其大著《为善一辩》中曾对害羞作过简要的宗教哲学探讨。《论害羞与羞感》明显受到索洛维约夫相关论述的启发，然而，与舍勒从情感现象学的人类学—社会学角度所作的剖析相比，索洛维约夫的羞感论显得过于空泛。^②遗憾的是，《论害羞与羞感》写于1913年，本拟次年完成，却一拖再拖，最终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完稿。舍勒从自己提出的身体情感与意向性情感的现象学区分出发，将羞感区分为身体羞感和意向性羞感（精神羞涩），如今我们只能看到讨论身体羞感的部分，讨论精神羞涩的部分仅存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哲人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现象学”在战后一度成为现象学中的显学，给已然气息奄奄的现象学打了一剂强心针。舍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身体现象学”这一概念，但他在讨论身体羞感时对身体现象所做的现象学分析使得

① 参见洛维特：《舍勒与哲学人类学问题》，载《神学观察》，1935(6)。

② 参见 V. Solowjev：《道德的原始材料》，见《东西方文化评论》，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38 页以下。关于舍勒与索洛维约夫的关系，参见 H. Dame：《索洛维约夫与舍勒》，Berlin，1963（可惜此书在分析这两位思想家的共同点时忽略了羞感问题）。